

新闻写作 纵横谈

林 帆著

ZONG
HENG
TAN

浙江人民出版社

新聞寫作縱橫談

林帆

浙江人民出版社

扉页题字：郭绍虞

封面设计：范一辛

新闻写作纵横谈

林帆编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68,000 印数 28,001—33,500

1980年9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二版 1986年2月第3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176 **定 价：**0.95 元

再 版 的 话

这本书是四年前印行的，翌年第二次印刷。可能是这类读物太缺的缘故吧，印行后没多久即脱销。我不断收到读者来信，向我索书，穷于应付，我只好把矛盾交给出版社，请他们解决。

出版社果然决定再次付梓。但这次不是重印，而是再版；要求我有所增删。这也正中下怀；因为近年来形势发展很快，本书又是乱后初期逐篇写成的，今天看来，不少提法不合时宜，取例也不脱当年的痕迹。因此，我决定从头到尾加以修改和补充。现在拿来和读者“重逢”的，是旧貌添新颜的修订本。

我本来以为这本过时的小册子就此“寿终正寝”，不会再出现在书店的货架上了。由于读者的关怀和垂爱，我才鼓起勇气补进一些新的篇章，改动了大量例子，因而给它以新的生命。这是读者鼓励和鞭策的结果，在这里，我特别表示衷心的感谢。

林帆

1984.6.21

厦门旅次

序

王 中

这个本子，很可以称为“杂集”，因为它左右开弓，杂而有章，娓娓而谈，洒的较开；现在叫做“纵横谈”，还不失为名正言顺，顺理成章。

合南北曰纵，连东西为横。以纵横交错的方法谈新闻写作，未始不是有益的尝试。作者自己说，要搞好新闻写作，首先要跳出新闻写作，然后再立足于新闻写作。这话不无道理。新闻报道无所不包，天南地北，沧海桑田，是以记者笔下，不避其“杂”，在表达上也不必拘于一格。

近年来看到一些谈新闻写作的书本，大多从横的方面入手，诸种体裁逐一开列，各立门户。这当然是一种方法，但不见得是唯一的方法。谈写作道理，有条条的，也有块块的，彼此兼顾得好，才容易洒开，做到纵横捭阖；而且只重条条兼顾不了块块，恐怕也难免议论重复。《新闻写作纵横谈》采用了彼此兼顾的体例；我说是有益的尝试，仅就此而言。

新闻写作应该不拘一格，但又不能没有一定的规格；因而入门容易精益难。讲新闻写作，体裁当然要讲，可是不宜分得太细，凡事繁琐了反而叫人不得要领。所谓“格”者，正也。譬如习字，从前初学毛笔要临格，以正一撇一划；象

九宫格、米字格之类，就是要给初学者以规矩，而要运笔熟练，自成一体，“格”于我则成框框矣。写新闻所忌者，正是如此这般的一板一眼；换句话说，用事实说话，有一定的规矩，但斫轮老手，却能独出心裁，佳篇常在格外。唐人方干有诗云：“直缘多艺用心劳，心路玲珑格调高。”没有用心劳，不可能格调高。我以为要真正学会新闻写作，恐怕主要不在于学习写作知识之类读物。勤于笔耕的实践很重要，辞章修养的基本功是根基；多艺而又用心，不受框框束缚，心路自会玲珑。鲁迅要我们不要相信小说作法之类，也有一定的道理，即便这本“纵横谈”，真的做到纵横捭阖，也不过是作者的经验之谈，不是什么万应灵丹。俗话说得好，“师傅引入门，修行在自身”，如此而已！

小可斗胆，信口雌黄，望作者和读者有所谅解焉。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日

目 录

再版的话

序	1
漫话文风	3
新闻写作渊源谈	13
新闻琐谈	20
综谈体裁	40
新闻的“可读性”	52
文艺与新闻	62
——真实性漫谈	
关于“怎样写”	75
——兼谈典型报道	
白描与新闻写作	84
通讯写作中的叙述与描写	97
通讯写作中的抒情和议论	111
人物通讯琐谈	124
“现身说法”和“画眼睛”	129
——关于写人物	
新闻报道和语言	138
比、兴和新闻写作	153

科教报道絮谈	161
谈谈社会新闻	170
文学为体 报告为用	175
——关于报告文学	
海阔凭鱼跃	187
——关于杂文	
不只是为了修饰	197
——修辞杂谈	
画龙点睛	210
——谈新闻标题	
不要小看这一“点”	229
——标点符号杂谈	
言犹未尽末一章	239
——学习与积累	

序

王 中

这个本子，很可以称为“杂集”，因为它左右开弓，杂而有章，娓娓而谈，洒的较开；现在叫做“纵横谈”，还不失为名正言顺，顺理成章。

合南北曰纵，连东西为横。以纵横交错的方法谈新闻写作，未始不是有益的尝试。作者自己说，要搞好新闻写作，首先要跳出新闻写作，然后再立足于新闻写作。这话不无道理。新闻报道无所不包，天南地北，沧海桑田，是以记者笔下，不避其“杂”，在表达上也不必拘于一格。

近年来看到一些谈新闻写作的书本，大多从横的方面入手，诸种体裁逐一开列，各立门户。这当然是一种方法，但不见得是唯一的方法。谈写作道理，有条条的，也有块块的，彼此兼顾得好，才容易洒开，做到纵横捭阖；而且只重条条兼顾不了块块，恐怕也难免议论重复。《新闻写作纵横谈》采用了彼此兼顾的体例；我说是有益的尝试，仅就此而言。

新闻写作应该不拘一格，但又不能没有一定的规格；因而入门容易精益求精。讲新闻写作，体裁当然要讲，可是不宜分得太细，凡事繁琐了反而叫人不得要领。所谓“格”者，正也。譬如习字，从前初学毛笔要临格，以正一撇一划；象

九宫格、米字格之类，就是要给初学者以规矩，而要运笔熟练，自成一体，“格”于我则成框框矣。写新闻所忌者，正是如此这般的一板一眼；换句话说，用事实说话，有一定的规矩，但斫轮老手，却能独出心裁，佳篇常在格外。唐人方干有诗云：“直缘多艺用心劳，心路玲珑格调高。”没有用心劳，不可能格调高。我以为要真正学会新闻写作，恐怕主要不在于学习写作知识之类读物。勤于笔耕的实践很重要，辞章修养的基本功是根基；多艺而又用心，不受框框束缚，心路自会玲珑。鲁迅要我们不要相信小说作法之类，也有一定的道理，即便这本“纵横谈”，真的做到纵横捭阖，也不过是作者的经验之谈，不是什么万应灵丹。俗话说得好，“师傅引入门，修行在自身”，如此而已！

小可斗胆，信口雌黄，望作者和读者有所谅解焉。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日

漫 话 文 风

谈新闻写作，首先要谈文风。文风问题，也就是学风问题，党风问题。而文风的端正，首先在党风的端正。今天谈文风，却不能回避这样的现实问题：为什么我们党几十年来一直在反对党八股，可是老鼠过街，却熟视无睹，八股文风不绝如缕，而且越闹越凶，最后发展为登峰造极的“帮八股”？为此，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八股文风存在的根源，从而进一步看清它的危害。

八股文风的形成，与封建社会后期所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分不开。没落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箝制和扼杀萌芽的资本主义思想，制定了以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所谓八股，有一定的程式，并美其名为“代圣贤立言”。从明到清的五百多年间，都以八股取士来麻醉和控制知识分子，应举的文人于是开口不离三皇五帝，下笔总归三纲五常。因此八股成为封建主义文化专制的一种特殊产物。

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提倡八股文风，借助“圣贤”这块灵符。中国的历史有足够的材料说明，广开言路的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空气活跃，文风也清新；反之，则万马齐喑，学

术空气凝滞，人们“欲说还休”，只好假话、套话连篇累牍，怎能有新鲜活泼的文风？

八股文风的特点在于千篇一律，人云亦云。“四人帮”反对社会主义，正是威风凛凛地打着批资本主义的旗号进行的，你不听我的，你就是“封资修”。说真话要担风险，那么，“和尚念经”，言不及义，保险系数最大。我们常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而林彪、四人帮搞的是“以言治罪，闻者足悸”，谁还敢说心里话，生动的革命文风又从何而来？

历来的文字狱——以言治罪可怕，因为那是飞来横祸，防不胜防，连龚自珍也直言不讳：“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四人帮”肆无忌惮地搞文字狱，丝毫不比明清的“文字官司”逊色。轰动全国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就是文痞姚文元在上海抛出了黑文《评“三家村”》，全国报刊奉命转载，构成了一桩触目惊心的文字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昭雪的冤案错案中，当时被曲解为反动或者反革命言论的不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吗？！

八股文风，有时还因为“长官意志”在揠苗助长。这里指的“长官意志”，是指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而瞎指挥的“长官”意志。作为无产阶级的报纸，作为党报的记者编辑，“遵命文章”一定要做的，问题在于遵谁的“将令”怎样遵法。

一家省报的同志曾抱怨说，报纸的版面常常给上面一个电话就给全盘冲掉。有一次开个什么全省的专业会议，分管这方面工作的书记要报纸腾出三个版面来登载大会的报道、代表发言、决议和图片。那天的报纸，就突然变成了大会的“会刊”。可能有人会说，重要的会议就非得这样突出不可，大造声势嘛！突出不等于倾盆大雨，连篇累牍，还得看

我们有没有革新的胆识。为什么动不动就用“重磅炸弹”那样的万言通讯或者占去大半个版面的消息压得读者难以喘气呢？甚至开一个表扬先进的大会，竟用两个整版去刊登积极分子的名单，到底有多少人看？如果体谅读者读报的心情，更多地了解下情，就能真正按办报规律领导报纸，那么，长官意志就会变成群众意志，报纸的版面也就能呈现出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的生动活泼的面貌。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新闻工作也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新闻工作者也有了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报纸版面也开始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正如胡乔木同志在建国初期所说：“在国民党统治下，我们不能报道真理，在宣传虚伪的所谓新闻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报纸、杂志和广播用不真实的和有害于人民的新闻，蔽塞人民的耳目，毒害人民的思想。反对这样做的新闻工作者就受到限制和迫害。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新闻工作者传播真理的自由才能受到政治及物质的保证。我们中国现在是有这些保证了。”

现在，新闻工作有了报道真理的自由，但是要真正做到在报道中保证新闻的真实性，达到好的社会效果，就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党的三中全会要求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此，认真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帮助群众同心同德搞四化建设，就成为新闻战线的重要任务。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不是脱离党的领导的舆论中心，更不是报纸从业人员的自由论坛。在报纸上写社论、评论，发表消息，都应替

党和人民说话，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批评各种错误思想，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能凭个人好恶，随心所欲地评头品足，乱发议论，更不能同党中央唱反调。坚持党性，就要求在宣传工作中注意体现实事求是、团结和向前看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报纸宣传上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对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决不能粉饰、掩盖；团结的精神，体现在文风上就要力戒那种盛气凌人、板着面孔训人的八股调，而要采取与读者平等的态度，陈述观点要鲜明，不回避矛盾，但又要对读者平心静气，循循善诱；向前看的精神，就是要向读者指明前途，要鼓气而不是泄气。

二

谈到文风，很自然地就想起郭老谈文风（《答〈新观察〉》记者问）说过的几句话：老实一点，是做到准确的好办法。不一定要苦心孤诣地去修辞。逻辑和文法，其实也就是老老实实的方法。

所谓准确，只不过是恰如其分的语言正确地反映客观真理罢了。我们搞宣传工作的，更要一丝不苟，一词不苟；力求每使用一个词，每说一句话，都要实事求是。方就是方，圆就是圆，这是我们说话写文章达到准确性的基本要求。假如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简单明确的判断都想回避，还有什么话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呢？当然，林彪、“四人帮”搞的那套，曾经严重地污染了我们的报纸刊物。但是，远在四人成帮之前，我们的报纸刊物就存在好大喜

功，喜欢说过头话的现象了。在五十年代末，上海的报纸就曾一本正经地提出过什么“拳打落后思想，脚踢落后指标”之类的过“左”的口号，要求工厂一年翻一番，翻几番，要“几天内实现煤气化”；当时要破除条件论（这是对的，问题在破条件论得有条件），说“巧妇可作无米炊”，还宣称“今天做好梦，明天就是粮”。甚至还提出许多做梦也梦不到的“太虚幻境”，比如要在市区七天内实现无盗窃，无流飞，无赌博等的“七无”，几个月内基本扫除文盲，三年征服癌症……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以致浮夸成风。说实在话，即使是事隔二十年后的今天，还不免可望而不可即。因此说，准确性，就在于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凭胆量开空头支票。在这里，我又想起了周总理为我们改文章的一个范例。大约是十年前，上海的地质水文工作者研究出一套办法初步解决上海地面沉降的难题，写成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据作者说，最初定了一个十分豪迈的题目，叫做《上海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座不沉的城市》。总理十分关心这个问题，亲自审阅该稿，就对这个题目提出异议，认为话说过头了，应该留有余地。作者后来根据总理的意见改了题目。原题看来确有实事求是不足之嫌，不够准确。姑不论是否“世界第一座”，即使真的成为“不沉的城市”，也得由日后的实践来检验。幸亏改了题，否则后来就要招惹笑话了。总理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我们搞宣传的同志学习！

不讲科学，还容易助长迷信。我们的报刊不会宣传迷信，只是避讳种种，不在少数，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迷信。人为地设置了禁区，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避讳在我国是有悠

久的历史传统的，这自然与封建迷信有关，《公羊传》里就有“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之说。意思是对有些禁忌不敢直说，便趁而隐之。最早是讳神，尔后及于人。在封建社会，至尊莫过于君父，所以主要也不外乎避君讳和避亲讳。实际上所谓避讳者，说穿了不过避人言、畏舆论而已。而我们今天的避讳，恐怕“本是同根生”的。为了有所讳，我们看到一种怪现象：因人废言，因言废文，疑虑重重。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凡是父子、夫妇，手足之情，情人之情，甚至同志之情，通通被说成是人性论。这种流毒是不能低估的。

三

“长风”泛滥，空话连篇，是“帮八股”的又一个显著特点。这对我们是很有影响的。他们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以倾盆大雨折磨群众，却想不到我们自己受尽折磨又反过来以长而空的东西去折磨别人。有的同志以为文章不长不足以显示份量，殊不知那种臃肿的庞然大物读了所得甚少，起不到宣传教育的作用；而且引导人们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助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毛主席有个妙喻，说长而空的文章象“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所以说，“谁看？”这个“谁”，指的是广大群众。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说穿了，是缺乏群众观点。

卖假药的人只靠两块嘴唇皮，滔滔不绝是为了招徕生意。“四人帮”那些连篇累牍的大块文章，无非是一块块假的狗皮膏药。明明是瘪三，却要打肿脸充胖子，只好到处摘

引马列和毛主席的字句，夹杂在连篇假话和连篇大话之中，这样的生搬硬凑，哪来不长？通过他们控制的报纸和广播，上行下效，更使懒婆娘式的八股蔓延成风。我们写东西是给人家看的，也要讲求效益；搞宣传，更需要有战斗力。一开头就摇头晃脑，摆足架子，人家硬着头皮也看不下去，有什么效果可言呢？从前有过两个对比鲜明的故事，一个叫“博士卖驴”，说卖驴告示竟然“书券三纸，未有‘驴’字”。别人怎么知道你要买驴子呢？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另一个是“杨志卖刀”，开门见山，目的明确，他“插了草标儿，上市去卖”。牛二问价，杨志只说：“祖上留下宝刀，要卖三千贯”（见《水浒传》）。那就干脆利落得多了。写文章一定要考虑到读者，考虑到读者时间的可贵，而不是着眼于“我的文章”。《人民日报》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提出反对“帮八股”，集中地反映了群众不欢迎“长风”的呼声，报纸面貌为之一新，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报道和文章大大增加了，透出来清新的气息。可是由于“帮”风影响很深，改还得有个过程。要学习毛主席的革命文风，要认真树立群众观点。否则报纸上硬拉长的文字还不会敛迹。比如就在同一时候，看到上海《文汇报》的一则报道，题为《明知江水寒，偏向江中冲》，写上港九区几位青年工人奋不顾身抢救国家物资的英勇行为，全文不过一千五百字左右，废话却占了很大的篇幅，很有点“博士卖驴”的味道。且录它开头几段：

砸烂“四人帮”，革命精神大发扬。战斗在上海港的广大码头工人，以大庆工人为榜样，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废寝忘食，大干快上，一批又一批先进人物正在不断